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九集

楚文化研究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九集

楚文化研究会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楚文化研究论集. 第9集 / 楚文化研究会编.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25-5880-3

I. ①楚… II. ①楚… III. ①楚文化—研究—文集
IV. ①K871. 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1232号

楚文化研究论集(第9集)

楚文化研究会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颛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321,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5880-3

K • 1378 定价: 4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T:57602918

目 录

古文字研究

鄂君启节“鄂”地辨析	刘和惠	(2)
河南新出阤夫人嬪鼎铭文记载岁星太岁纪年考	王长丰	(11)
九店楚简历法考	王胜利	(34)
新蔡葛陵楚简社稷祭祷文书初探	晏昌贵	(39)
楚“鄂君”、“鄂县”综考	郑 威	(54)
试说楚文字中恭字的异体	黄锦前	(64)
丁家咀战国楚墓出土竹简	李永康	(73)
先秦鸟虫书在汉代装饰中的演变与应用	李晓娟	(76)

历史、文化研究

楚淮古地丛考(二)	陈立柱	(84)
楚官新得	许道胜 郑忠华	(104)
关于湖南地区楚漆器的生产、管理和产地问题的 再讨论	聂 菲	(130)
峡江地区环境对楚人生计的影响	黄尚明	(141)
楚国地理空间体系与丹阳地望	尹弘兵	(158)
论“江旁十五邑”的孤岛文化	谭远辉	(173)
论吴楚文化的交融	肖梦龙	(180)
论楚国食文化的特征	陈文华	(194)
后应国时期楚国“方城之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与 文化融合	王龙正 王宏伟	(203)

生境的选择与楚文化的兴起	笪浩波	(214)
南阳楚文化与南阳汉文化	马 骥	(231)
浅述楚辞《九章》的艺术表现	王婉尧	(241)

考古学研究

关于楚鄂地之谜和楚都丹阳之谜的思考	刘彬徽	(250)
舒城、凤阳、蚌埠发现春秋钟离国墓葬——蚌埠双墩		
一号钟离君柏墓发掘取得重大考古新发现	阚绪杭	(255)
周口市楚国文化遗存的初步研究	李全立	李红学 (262)
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年代与族属析论	徐少华	(274)
岳阳楚文化考古简说	郭胜斌	黎 定 翁熊胜 (282)
南阳八一路楚申县贵族墓地埋葬制度初探	乔保同	(291)
襄樊秦墓楚文化因素的初步考察	王先福	(299)
三峡地区东周时期城址的考古研究	杨 华	(310)
试析湖北孝感东周墓葬	刘志升	(322)
古吕国地望的文献和考古学考察	尹俊敏	(340)
春秋楚邑——叶邑周围墓葬的分布与研究	张方涛	(348)

器物研究

从羊子山 M4 青铜器群看西周鄂国的

地望	傅 玥	高旭旌 (360)
河南出土楚国青铜兵器述略	王蔚波	(369)
楚式镇墓兽形制内涵研究	黄 莹	(389)
南阳两周墓出土楚系玉璧及相关问题探析	任义玲	(402)
楚文物中的怪异神兽造型浅析	院文清	(411)

古文字研究

鄂君启节“鄂”地辨析

刘和惠

鄂君启节交通路线起点“鄂”地，其地望经前辈学者郭沫若、商承祚、谭其骧等各家考释，一致认为即历史上的鄂邑，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今湖北省鄂城附近。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友人船越昭生教授在《东方学报》（1972年京都版）发表《鄂君启节考》一文，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节文中的“鄂”地是历史上的“西鄂”，今河南省邓州附近，而不是江南之鄂。对此，黄盛璋先生曾著文驳议，认为无据^①，但未深入考证。国内学者也有从“西鄂”说者。近年，日本友人谷口满先生又提出“中鄂”说，认为鄂君启节中的鄂地“是位于东鄂西鄂之间汉水支流的某个地方”^②。几说并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古地名方位的不同见解，而且涉及鄂君启节节文整个水陆交通路线及许多地名、水名的落实和复原问题。显然，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辨析。

一、“鄂”地的由来

江南鄂地的由来，在古籍中缺乏记载，前人也未留意这一问题，似乎无从谈起。今天幸有考古资料的发现，结合有关鄂人的记载，我认为对鄂地的由来是可以理出一个端绪的。

鄂，原文为“噩”，可能以鳄为图腾而得名的，传说为黄帝部族的后裔，姞姓，是一个古老的氏族。到夏代，鄂已发展为一个较大的部落，因此，商王朝登上历史舞台后，即封其首领为噩侯。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噩侯”的记事。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时“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

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辩）之急，并脯鄂侯”。《战国策·楚策三》也提到此事。“脯醢”是一种野蛮的极刑。鄂侯遭此难，其氏族也受到连累。

鄂族原来生息于河套与汾水之间，其地望在今山西省乡宁县一带。据有关地理典籍和方志的记载，乡宁县东有“鄂山”，东北有“鄂水”，就是鄂人在这里长期生息留下的山名、水名。他们是以渔猎和种植作物为生的。鄂侯被处决后，纣王对鄂族众不放心，强迫他们离开故土，迁徙于后来的沁阳境内。这里距殷都朝歌不远，显然是为了对鄂人就近监控。

纣王无道，遭到众部族的反对，姬发起兵讨伐，各路诸侯多从之，牧野一战，商王朝数十万大军一触即溃，顷刻瓦解，纣王自焚，商朝覆亡。在灭商之役中，鄂人自然站在姬发率领的讨伐大军一边，他们希望胜利后能够回到故土，这是很自然的心理状态。可是，却事与愿违。

武王代商，登上王位。周初的政略部署，是大封同姓诸侯，把近亲子弟封于要地，镇守一方。出于鄂人意料之外，周王朝将鄂族故土封给成王弟叔虞，而将异姓诸侯的鄂国迁徙到南阳盆地，作为成周的王畿外围。这当然使鄂人十分不满，但慑于新王朝胜利者的强大威势，鄂侯不敢有异言，只得服从，迁徙到周王朝指定的封地。不知是出于鄂侯的谋划，还是鄂族内部的分歧，到达封土南阳盆地后，一部分鄂人悄然南迁。这一事件由在湖北随县羊子山出土的几件“鄂侯弟历季”器物，揭开了谜底。

1976年8月湖北省襄阳地区随县西20公里的羊子山出土一件青铜带盖尊，外形略呈椭圆，敞口，腹部有一兽首鳌，鳌下有珥，圆底，圈足内敛，器身有四道弦纹，腹内底部有两行八字铭文“鄂侯弟历季作旅彝”，尊高19.5厘米，重3.6公斤^③。该墓曾经被盗，器物流散，现在已知尚有两件器物也是出土于该墓。一件为青铜卣，有盖，束颈有耳，垂腹，腹部有一兽首鳌，圈足，器、盖都有两行八字

铭文，“鄂侯弟历季作旅彝”，与上述青铜尊铭文完全相同，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④。另一件为青铜簋，子母口，鼓腹，有对称两耳，失盖，内底有两行八字铭文，与上两器铭文完全一致，现藏洛阳市博物馆^⑤。这几件“鄂侯弟历季”器系一组，显然出于同一墓葬，从器物形制、纹饰、文字、组合特点看来，具有晚商和西周早期的风格。它的时代不会晚于西周成、康时期。

这一组器物说明，这支鄂人是在西周早期，由鄂侯弟历季率领南迁的，曾经打算在随地长期居住。停留期间，鄂侯弟历季亡故，所以墓葬遗留在该地。但是，他们在随地并未定居下来，其原因可能是周王朝向南开拓扩展，并在随地封置宗亲侯国^⑥。他们不得不离开随地，继续向南迁徙。

这支鄂族南下渡江至今鄂州一带停住了脚步。这里北濒大江，附近湖泊甚多，水草茂密，宜于渔猎，亦宜于种植，谋生较易，于是定居下来。他们生息于此，但并未立国。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是江南之鄂地最早见之于史书的记载。这段文字，对“鄂”的地望交代很清楚。有的研究者认为司马迁在《楚世家》提到的“鄂”是“西鄂”（即南阳之鄂），这是没有根据的：第一，“西鄂”不在“江上”；第二，“西鄂”不是当时所称的“楚蛮之地”。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见解，主要是过去不明“江南之鄂”来由之故。

关于南阳盆地的鄂国史事，史书上缺乏记载，幸有几件鄂国以及与鄂国史事有关的文物出土，带来了可靠的信息，揭开了历史之谜。

1. 上述“鄂侯弟历季”器，以及历史上出土的传世品“鄂叔簋”、“鄂季奄父簋”（两器现藏上海市博物馆），俱为西周早期器物，

说明鄂是周初的封国。

2.“王姞簋”，亦是历史上出土的传世品，见于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有铭文 17 字：“鄂侯作王姞媵簋，王姞其万年子子孙永宝。”此器为鄂侯嫁女于周王的媵器，反映鄂侯曾与周王室联姻，其时代约在西周早、中期。

3.“鄂侯驭方鼎”，同为历史上出土的传世品（现藏上海市博物馆），共有铭文 86 字，记载周王亲征淮夷，归师途经鄂地，鄂侯朝见献礼，周王与之宴乐同欢，并加赏赐，以示恩宠。此鼎时代有穆王、夷王、厉王三说，以夷王说为妥。

4.“禹鼎”，宋代曾有著录，但文字难以通读。20世纪 40 年代，陕西又出土一件，其铭文是记载周王讨伐鄂国的史事，系有关鄂国历史的重要史料：“……亦唯鄂侯御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厉寒，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裂伐鄂侯御方，无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徙御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御方。……”^⑦此器的时代以徐中舒厉王说为是^⑧。

鄂是周之封国，鄂侯是周王之臣，为什么叛周，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我认为，主要是周王朝对异姓诸侯的政策所致。西周一代的劲敌是淮夷，不断受到侵扰，周王朝虽多次出动大军征伐，但收效甚微，解决不了问题。鄂国所在的南阳盆地在成周之南，系周东都的外围。可以想见，难免受淮夷的威胁，同时也受到王朝大军过境之扰，鄂族不能自安。可能早就与淮夷暗中往来以求自保，终于联合淮夷叛周。周王对异姓诸侯的叛变，十分震怒，调动大军，下令严厉镇压，“老少不留”。这是一件灭国灭族的暴行，推测鄂人极少能够逃此劫难，鄂国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

此事件发生在周厉王时期，除禹鼎的时代可以说明外，这里还可以提供一条旁证，《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在“江上”拓疆辟土立三子皆为王，“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

王”。是什么事件令熊渠如此震动？鄂侯叛周遭到灭国灭族的下场，这一事件引起熊渠的惊惧，因为熊渠立三子为王是对周王朝的叛逆行为，当时楚国尚不足与周王朝抗衡，只得取消王号。

鄂国被灭后，周王朝必然在该地留驻重兵，以防淮夷的侵袭报复。不久，至周宣王时，迁申伯于此，置申国（又称南申）。春秋初期，楚国灭申，据有该地。据何浩先生考证，约在楚文王三年至六年之间（前687～前684年）。楚以申为县^⑨，设县公，见于史书的有“申公斗班”^⑩。1975年，南阳市发现一座春秋楚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表明墓主为“申公彭宇”^⑪。可见，鄂国故地入楚后，一直是申邑。

楚地无“西鄂”之名，更没有“东、西鄂”之称。从西周至战国，楚国只有一个鄂地，即位于江南的鄂邑。持“西鄂”论者的文章中屡屡出现“西鄂”、“东鄂”的名称，好像楚国有两个以“鄂”为名的县邑，这样会误导读者的。“西鄂”是西汉出现的县名，“东鄂”是后人虚拟的，历史上从无这一地名。如果把鄂君的封地置于南阳，那么，为什么不称“申”地、“申君”，而称“鄂地”、“鄂君”呢？这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

二、“油”字还是“湖”字

1986年，陈伟先生发表《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一文，提出舟节节文中“自鄂市，逾湖”的“湖”字，应释为“油”字，并说“油水即是清水”，“清水经过西鄂等地注入汉水，正相应于舟节‘自鄂市，逾油’而入汉这段航程，鄂自然应即西鄂”^⑫。这是国内持“西鄂说”学者提出的唯一的一条论证。

“油”字还是“湖”字？虽然只是一个古文字的考释，但是此字在节文中关系至大，涉及节文许多地名和交通路线的复原和定位，所以有必要进一步考辨，澄清疑点。

节文中的湖字，原文为“澨”，从水从吉。鄂君启节出土后，郭沫若、商承祚、谭其骧等多位前辈学者，一致释读该字为“湖”，

并无异议。陈文认为“古字上部十字交叉，横划长出；由字上部则只有一竖划，或在竖划中著一圆笔。……因此，舟节此字读古似不可从，应改读为由”。不错，节文中“湖”字右边之“古”上部“十”字横画是一圆点，看来，这是问题的焦点，如果该字不是古字，当然要改释；如果是古字，那么，就确证为“湖”字，前輩学者所释不误。

鄂君启节共有 311 字，全篇文字都十分工整，这在出土的楚金文、简策文字中是比较罕见的。我曾在一篇拙文中说过：鄂君启节“也是一件具有艺术价值的工艺品和书法作品”^⑩。节文的排列、笔画是经过计算和设计的。文字中的圆点是艺术装饰，而不是正常的笔画。从整体看来，圆点代表的是横画，并且大都是横直交叉如“十”字的横画。节文有四个“十”字（“车五十乘”、“屯十以当一车”、“毁于五十乘之中”、“五十舸”），其横画皆以圆点代之。以圆点代横画的字共有 23 个^⑪，可以说，以圆点代横画是鄂君启节的书法艺术特点之一。节文“湖”字右边口字上部十字，与节文中四个“十”字形体完全一样，都是以圆点代横画的，确证为“十”字。节文中以圆点代横画的字，尚有从土的土字上横，金字中间的横画等，皆是横竖交叉的横画。我们了解鄂君启节节文的特点，上述陈文所提的疑点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陈文提出另一个疑点：“舟（车）节中也有从古而作的居字，则和常见的古字一样。”不错，车节中“適居巢”的居字所从之古，没有以圆点代横画，但是不足为怪。鄂君启节有三百多字，以圆点代横画的只有二十多个字，不及十分之一。不是所有横画都以圆点代之，也不是凡横竖交叉的横画皆著一圆点。节文文字的装饰是从整体审美观出发的，不是着眼于几个字。不仅是“湖”和“居”字所从之古形体有异，就是同一个字也出现这种现象。如舟节和车节都有“自鄂市”三字，车节的“市”字所从的土字上面一横，以圆点代之，而舟节“市”字是正常横画，未以圆点代之，我们不能认为这是

两个不同的字。明乎此，疑点就自消了。

关于“由”字，王国维曾有详考，他在《释由》一文中说：“余读敦煌所出汉人书《急就》残简，而知《说文》由字即由字也……汉简由作由，其三直皆上出，与说文由字正同。”又举番生敦盖、毛公鼎从“由”之字为证，言“是篆文从由作者，古文从由作，是由由为一之证”^⑩。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简中从由之字较多，大约有二十多年字^⑪，由作“𠂔”。江陵秦家嘴 99 号墓出土的从由之字也作“𠂔”^⑫。《说文》由字注云：“𠂔，古文。”

据上所述，可见古文中的由字和古字结构是不同的，由字从丰（或丰）从𠂔；古字则从口从十，不难区别。古文中由、𠂔二字可以互通，故从由之字也有作𠂔者，这里就不拟涉及了。

鄂君启节之“泊”字，前辈学者释“湖”不误。该字右边系古字，而非由字，可以确认。

三、余论

20世纪三十年代，学术界在《楚辞》地理研究中出现一种“楚地不到江南论”。有学者提出：“《楚辞》所言沅、湘、洞庭之属，皆大江以北之地名”；屈原放逐之地“乃在汉北，非至湘南也”；“鄂渚者，《汉志》南阳有西鄂，其地有淯水、方林，则〔在〕方城之野。……沅之为水，即涢（鄖）、即汎（舞），必近南阳西鄂”。又言“所谓江者，即汉也”；“江湘并称，即湘水也，湘即汉”。可是，只是亮出论点，却无实证。唯一的论据是，“今湖南洞庭瀟湖，在当时为蛮荒，中原文物所未被，风教所未及”^⑬。当时学术界也有不同见解驳其说者，但亦缺乏资料论证。这种讨论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

七十多年前的这场讨论，使我们了解了“西鄂说”的源头。不过，今天不同了，建国以后，考古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据统计，湖北、湖南两省发掘、清理的楚墓已超过一万座，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考古资料。历史地理是一门实学，我相信，学术上的不同见解，通过讨

论是会达到一致认识的。

鄂君启节圆点代横画文字字例

郢	金	屯	徒	市	丘	城	十	湖
---	---	---	---	---	---	---	---	---

注释：

- ① 黄盛璋：《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安徽史学》1988年第2期。
- ② [日] 谷口满：《再论楚郢都的地望问题》，《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2页。按：鄂地问题在该文中仅是顺便提及，并未展开论述，也无实证，故暂不论及。
- ③ 王少泉：《随县出土西周青铜单鑿尊》，《江汉考古》总第3期，1981年。
- ④ 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7期。
- ⑤ 张剑：《洛阳市博物馆馆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丛刊》(3)。
- ⑥ 据何浩考证，曾国在随地始封时间，“不出西周早期，……在周昭王之前”。见《楚灭国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8页。
- ⑦ 上几件鄂侯器及禹鼎参阅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1~24页。
- ⑧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54年第3期。
- ⑨ 《左传》“哀公十七年”，楚“实县申、息”，杜预注“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
- ⑩ 见《左传》“庄公三十年”。
- ⑪ 参阅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
- ⑫ 陈伟：《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以下引该文不再加注。
- ⑬ 拙作：《鄂君启节散论》，载《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7页。
- ⑭ 见鄂君启节原件，藏安徽省博物馆，下同。
- ⑮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84年，第274~279页。

- ⑯《曾侯乙墓》下册竹简图版,文物出版社,1989年。
- ⑰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633页。
- ⑱钱穆:《楚辞地名考》,《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三期,1934年;《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禹贡》半月刊第七卷一、二、三期合刊。

河南新出阤夫人嬪鼎铭文记载 岁星太岁纪年考

王长丰

《阤夫人嬪鼎》(图一.1,2006HXXM11:11)是2006年底河南省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徐家岭墓葬区HXXM11中发掘出土的^①。器上所铸刻的铭文“戒(岁)才(在)歛(涒)難(滩),孟屯(春)才(在)奎之遼(际)”是一种太岁、岁星混合纪年法,也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出土材料中记载的太岁、岁星纪年材料。该材料为春秋战国之际历法曾使用过太岁与岁星纪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这对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图一.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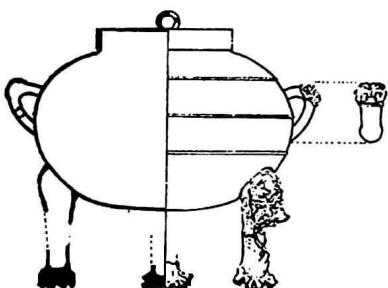
图一.2

一、阤夫人嬪鼎器形学研究

该鼎有盖,盖顶较平,周边立有四个较高的圆环钮,并间四个

突起的圆饼形饰，圆饼形器上饰涡纹及绞索纹。盖周边下折，饰一周蟠螭纹。小口，短直领，广肩，鼓腹，圜底，三蹄足。肩部饰对称的两个长方形环耳，耳上套一链环，链环内又套一大圆环。肩部下饰一周宽带蟠螭纹，并间六个突起的圆饼形饰，圆饼形器上饰涡纹及绞索纹。上腹部也饰一周宽带蟠螭纹及凸弦纹。下腹素面。三足上部饰浮雕兽面。通高 45.5 厘米，口径 22 厘米，最大腹径 40.2 厘米，足高 20.6 厘米。此鼎器形较大，器胎厚重，铸造精美，保存完好。现藏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

2006HXXM11 出土的器物尚有铜、玉、陶器具等，其中铜器包括鼎、簠、敦、壶、小口鼎等礼器及编钟、编磬等乐器和部分兵器、车马器。依据墓葬出土器物推断，M11 时代为战国早期。《阤夫人嬪鼎》器形制一般称小口鼎。这种鼎仅见于楚、曾、蔡，铜器和陶器中原地区均未发现过，而楚地却较普遍。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小口鼎为淅川下寺楚墓，为春秋中期器。《阤夫人嬪鼎》器形与 1986 年春安徽六安市九里沟乡九里沟村出土的春秋晚期器《襄王子汤鼎》^②（图二，现藏皖西博物馆）形制相近，比 1979 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室 185）出土的战国早期器《曾侯乙鼎》^③（图三，现藏湖北省博物馆）略早。从器形时代特征看《阤夫人嬪鼎》应为春秋晚期器，其制作年代要早于墓葬下葬的年代。



图二



图三